

BARRY BUZAN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世界历史中的
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英〕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

著

刘德斌 主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英]巴里·布赞
理查德·利特尔

著

刘德斌

主译

刘德斌 任东波 宋 鸥 王春雨
孙丽萍 张乃和 郭 蓓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3-0690号

“©Barry Buzan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原著以英文在2000年出版,本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并仅限于在中国大陆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英)布赞(Buzan, B.), (英)利特尔(Little, R.)著; 刘德斌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

书名原文: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BN 7-04-013206-0

I. 世... II. ①布...②利...③刘... III. 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2079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总 机 010-82028899

购书热线 010-6405458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50 000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者序

巴里·布赞其人和理查德·利特尔

英国科学院院士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近年来越来越为中国学界所熟悉。许多人认为他是英国学派的“领军人物”，是西方学术界安全研究的“泰斗”，国际关系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他的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的有《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时间笔记》(英文原著书名为《预测未来》，与西格尔合著)和《新安全论》(与奥利·维夫和德·怀尔德合著)等。据我所知，《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是巴里·布赞教授第四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

巴里·布赞教授20世纪40年代生于英国伦敦，在加拿大北方长大，成人后又返回英国求学，以后一直在英国居住和工作，具有英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布赞教授1968年毕业于英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1973年毕业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他曾经在英国考文垂郊外的沃威克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任教20余年，讲授国际关系，同时担任著名的丹麦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的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并成为安全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的领军人物。1996年，布赞教授移至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2003年，他又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回到母校继续他的教授生涯。

布赞教授著述颇丰，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其代表性著作包括《人民、国家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People, States and Fear: The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3, revised 2nd edn. 1991)、《战略研究导论：军事技术与国际关系》(*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Studies: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87)、《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1993, with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1998, with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The Arms Dynamic in World Politics*, 1998, with Eric Herring)和《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2000, with Richard Little)等。

布赞教授在英国和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早在1988—1990年,布赞教授就曾当选过英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1993—1994年当选为(北美)国际关系学会副理事长;1994—1998年当选为国际关系研究协调委员会的常务秘书长。1998年,布赞教授被遴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从1999年开始,他还担任国际关系英国学派重聚项目的总协调人。除了理论研究之外,他还参加有关欧洲、南亚、南非和东亚安全的公共政策讨论。他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国际安全的概念和地区安全、国际关系史、史前史时期以来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上。

巴里·布赞教授最早以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判而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安全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但把这时的安全研究称为“战略研究”更为贴切。二战后出现的马汉的“海权论”和麦金德的“陆权论”,以及60年代出现的“威慑理论”都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或战略研究的经典。换言之,安全研究主要体现为以国家为主体的战争现象研究。随着70年代东西方关系的缓和及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安全指涉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大辩论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全研究。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关心的不是权力而是安全。随着冷战的结束,开始了关于安全研究的第三次大辩论。在这之中,建构主义的安全观逐步形成。建构主义安全观可以分为欧洲学派和美国学派。欧洲学派即是以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以亚历山大·温特和彼得·卡赞斯坦为代表。1990年,布赞等五人合著的《欧洲安全的重铸:后冷战时代的前景》发表;1991年,布赞本人的《人民、国家和恐惧》第二版问世;1993年,布赞的《认同、移民和欧洲的新安全议程》出版,这三本书奠定了所谓“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析基础。1996年,哥本哈根学派的批评者马克斯威尼(Mcsweeney)和纽曼(Neumann)开始用“哥本哈根学派”称呼这些以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为中心、居住在北欧的研究者。没想到,“哥本哈根学派”却由此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一个专用名词,并使布赞等人为更多人所熟知。布赞等人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欧洲传统的军事安全成见必将式微,非军事安全因素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认为“社会安全”将成为理解欧洲新安全日程的最有效工具。在《人民、国家和恐惧》一书中,布赞提出了复合安全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传统的安全研究只关心国家和全球层次。布赞则认为,在国家和全球层次之间,存在一个地区子系统,即所谓的“安全复合体”。布赞的古典复合安全理论提出后,此书成为冷战后安全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之一,并由此奠定了布赞在国际学术界一流学者的地位。1998年,他与维夫和怀尔德合著的《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中

译本为《新安全论》)问世,把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进一步发展起来。(但遗憾的是,由于经费来源的中断,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安全研究项目即将中断。)

1993年,布赞与查尔斯·琼斯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的《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使布赞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声誉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他们在对沃尔茨新现实主义理论超越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了新现实主义”。布赞认为,沃尔茨强调结构层次上的权力及其分配,“严重低估了国际行为体的权威作用和组织作用”。除了权力,人们普遍认为“规则、机制以及国际组织也应该包括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定义之中”。他们提出了“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概念。布赞等人认为,政治结构既包括无政府状态,也包括等级结构。“深层结构”不仅包括权力和国际组织,而且包括规则和规范。系统的结构包含了国际政治体系,也包括国际社会体系。他们拓展了沃尔茨关于体系结构的概念,认为结构层次的分析 and 单位层次的分析是相互关联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必须发展这种关联。沃尔茨在很大程度上把单位层次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布赞等人则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在单位层次上的分析应该和在体系层次上的分析一样严格。他们还认为,单位行为体的实力的性质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结构。布赞等人对新现实主义的反思和拓展,还特别关注了体系转型和体系延续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应该超越沃尔茨关于结构是国际体系根本特征的观点,认为作为构成国际体系构成单位的国家也是由其自身结构决定的。与沃尔茨的论断正好相反,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并没有产生同质的单位。国内结构影响了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这一事实部分地解释了国际体系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异质性。他们认为,国际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下形成了主权国家,但主权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与合作和相互依存不能相容。以无政府状态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包括了合作模式。

《无政府的逻辑》不仅使布赞教授成为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流国际关系理论家,而且也使一直在战后国际关系研究居领导地位的美国学术界对他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说《无政府的逻辑》是对沃尔茨理论的成功超越和挑战的话,那么布赞与利特尔在2000年出版的这本《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则通过对世界历史中国际体系形成与演变的立体考察,对整个西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根本的挑战。

理查德·利特尔也是一位出生于40年代的英国顶尖学者,是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教授,英国国际关系学会现任主席。他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于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研究和国际关系史。近年来,他与巴里·布赞教授密切合作,先是共同(还有查尔斯·琼斯)撰写了意为为新现实主义重定方向的《无政府的逻辑》,继之又发表了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础——威斯特伐

利亚国家体系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他与布赞教授的研究兴趣并不完全相同,但对多元方法论的推崇,对“英国学派”优秀传统文化的珍爱和对权威理论的怀疑和挑战精神,使他们能够几度联手,亲密合作,在几年的时间里接连推出令国际学术界刮目的扛鼎之作,成为西方学术界领军人物中的黄金搭档。

关于《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阐释的是在6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如何从分散的采猎群演进成今天高度一体化的全球性国际政治经济体的历史。该书追溯了范围最为广泛的经济、社会 and 军事—政治国际体系的演绎,以及这些体系与部落、城邦、帝国和现代国家这些人类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影响。

布赞和利特尔把诸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视角相结合,第一次从一种国际关系的视角讲述了6万年的世界历史,对现有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历史上的国际体系思想提供了最为全面的阐释。他们对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其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狭隘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上的破碎,使其无论在跨学科影响方面,还是在过去与未来进行内在思考的能力上,几乎都已经失去了任何价值。布赞和利特尔认为该书对重铸国际关系学,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展示出其核心概念是如何可以经受时间跨度的考验,并为国际关系学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议程。

1.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

人们很早就对国家间关系的本质进行过探索和思考,如古代中国的孔子、孟子、墨子和商鞅的著述,印度的《摩奴法典》,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修昔底德的著作以及古罗马的法学家所制定的《万国法》等。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古已有之。然而,1618—1648年发生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和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在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英美理论界成为一种时间标识,而且也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弥漫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威斯特伐利亚“情结”。这种“情结”不但左右了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渗透到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中。

在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理论家们将主权民族国家、政府权力的来源和动能、国家内部的个人权利以及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作为研究的重心,“1914年以前,国际关系理论家几乎一致认为,国际社会的格局是一成不变的,世界划分为主权国家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关系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而

不是考察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①自一战后直至今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无论是理想主义、古典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等理论流派,还是威尔逊、摩根索、多伊奇、沃尔茨以及基欧汉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尽管他们建构理论的基础和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也和早期的理论家们一样,都未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编撰中,有的学者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因受种种客观条件所限,相互交往和联系既松弛,又不经常,多局限于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或为谋取王族的、宗教的权益而争斗。当时只是一种地区性的国际关系格局,还未构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因此,国际关系史应“着重从17世纪世界进入近代时期写起,其上限为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②无可讳言,在笔者所主编的《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

按照布赞和利特尔的观点,威斯特伐利亚“情结”遮蔽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停滞。他们认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五大弊端。它们是现代主义(presentism)、非历史主义(ahistoricism)、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无政府主义偏好(anarchophilia)和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

现代主义是指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学科快速紧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的专门见解的迫切需求,助长了一种前瞻性而非追溯往事的视角。因此,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非历史主义并不意味着过去与社会科学家毫不相干,相反,他们应该正在探究一些既适用于过去又适用于现在的普遍法则。这种目标是受这样的意愿支配的,即社会科学家效仿跨越时空的自然科学不变法则。带有实证主义者癖好的社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尽管在社会科学的大多数领域,对于非历史主义和历史主义二者的相对价值存在着—场持续的争论。但是,这类争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罕有发生。例如,沃尔茨就认为国际政治的“结构”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改变。^③又如20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假定均势为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提供了根基,这种超历史理论既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希腊城邦的行为,又为美苏间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说明。在20世纪最后1/4时间里,现实主义的而非历史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曾经困扰了社会科学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尔·普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②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总序第5页。

③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66.

的方方面面,国际关系学科也未能幸免。欧洲人通过把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人们纳入到有秩序的经济和战略联系中,从而创造了第一个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但是,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因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解释总是忽视非洲—欧亚大陆体系在欧洲人开始全球扩张前就早已存在这一事实。^①另外,欧洲中心主义也与东方学思想紧密相连。无政府主义偏好是非历史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的假定在新现实主义理论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效能经常表现出更加复杂的情感,自由主义者则倾向于把无政府状态视为战争和无序的主要原因。正因为我们头脑中有一个用无政府视角去思考国际体系或国际关系的先入之见,所以国际关系理论界很难摆脱无政府主义偏好的支配。而在其他学科中则很少见到这种束缚。欧洲和当代世界经验的特性对无政府主义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国家中心主义(或者是政治偏好)几乎不能从无政府主义偏好中分割出来,但它依然是产生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一个独特原因。虽然在国际关系学科里,对于国际关系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维度都已经给予了广泛关注,但是,对国际关系的研究仍然压倒性地集中于军事—政治维度。大卫·伊斯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指出:战后政治体系的概念不过是国家的代名词。^②

威斯特伐利亚“情结”使大多数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不自觉地囿于相对狭隘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内,并产生了一种狭隘的视野。巴里·布赞认为“这样一种经常用于标示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欧洲国家体系开始的方法,发挥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

时至今日,威斯特伐利亚“情结”所产生的研究视角仍在国际关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这一状况造成了诸多后果。首先,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被植入国际体系的正常条件,并衍生出历史的其余部分。其次,它意味着部落、帝国、城邦国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了,而国家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实体。再次,它意味着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扭曲的透镜(从某种程度上它影响了对历史的整个检视)来检视过去,而且它还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型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最后,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构建之外。

① 参见 Hodgson, Marshall G. S. (1993), *Rethinking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Europe, Islam and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见 Easton, David (1953),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为了克服和消除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负面影响与局限性,有必要引入和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重新构建。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对国际体系进行了考察,试图以此重新构建国际关系研究。

2. 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

巴里·布赞教授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的导言里,开宗明义地阐明了本书与其他国际关系著作的最大差别:“我们考察多重国际体系的整个历史,这段历史构成了一个超过5 000年的时期;而不只是追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350年间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巴里·布赞认为三方面的原因将世界历史与国际体系结合在一起:第一,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体系的概念化没有一个能够描述和分析国际体系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出现和如何演变的。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论水平由于不能从世界史视角考察国际体系,已经停滞不前了。第三,国际体系构成了发展世界史、同时也帮助社会科学家提高宏观社会现实分析的最有效的单位。这三个原因也是支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的三个假设。

众所周知,二战后“体系”思想在界定所有社会科学的学科界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术语越来越受到重视。体系思想不仅与学科界限的确立相关,它也与“行为的”或“实证主义的”转变紧密相关,这一转变寻求确保使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严密和技巧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20世纪后半期美国国际关系学强调体系思维,也与希望该学科沿着科学路线发展的意愿有关。致力于将国际关系变为一门科学的理论家们,像卡普兰、辛格和沃尔茨,都将注意力集中于国际体系思想,并且通过引证循环的行为模式确认体系的存在。将国际关系发展为一门科学学科的意愿,无疑鼓励了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到了20世纪末,虽然整个社会科学界开始更广泛地意识到历史学解释的重要性,但是理查森仍然注意到“国际关系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与国际关系学两个学科之间人为的分离”。^①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界定性特征已经持续下来。

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英国学派,其成员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或研究者,这种混合构成有助于解释其研究国际关系的独特方法。对英国学派而言,用体系视角去思考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方法与美国国际关系学所采用的方法迥然不同。与主流美国国际关系学形成对比,英国学派

^① Richardson, J. L. (1988), 'New Perspectives on Appeasement: Some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40, p316.

的确没有受到历史研究和理论发展是不相容的这种观念的限制。他们承认许多历史学家确实洞察到历史发展中的模式,并且设想理解这些模式发生的原因是可能的。英国学派避开欧洲中心论、非历史主义和现代主义,以及在沃森的著作中讨论过的无政府主义偏好和国家中心主义。按照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解释,《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使用“国际体系”而非“国家间”或者是更古老的“国家体系”,以及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体系”的术语,是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国际的’之主要对等物是‘世界的’和‘全球的’,后两者都注重所论关系的地理规模,而不注重牵扯到的关系的本质。……第二,我们愿意接受国际的这个术语中固有的可作多种解释的含义。它既有政治学含义又有社会学寓意。因此它不仅包含国家间关系,而且包括跨国关系。……就我们的需要而言,英国学派‘国家体系’概念中的国家中心倾向过于明显。第三,当今‘世界体系’一词与沃勒斯坦及其追随者紧密相连,我们不想混同于那个学派。第四,本书的一个意图是再次重申国际关系学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自主性。我们认为国际体系思想对此至关重要。……第五个理由就是,国际体系思想能够使我们在世界史学家的著作与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理论之间架设起跨学科的桥梁。”在此,巴里·布赞也阐明了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我们期待通过为国际体系确立一个更加广阔的框架来推进理论家与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进而通过增强对国际体系理论的和历史的理解,扩展我们对国际关系的全面认识。因而我们把本书视为‘长时段’历史与国际关系学体系方法之间的联姻。我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学的定义和理解方法,这不仅要依靠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者本身,还有赖于那些对社会科学宏观方面感兴趣的学者和世界史学家。”

然而,在过去 50 多年的时间里,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没有能够就体系的含义达成任何共识。这不仅使国际体系概念化论争中的方法未能确立起来,而且不同方法所包含的思考范围也时常没有被完全地绘制出来。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研究各种竞争的体系方法之间所存在的分歧程度没有进行适当的评价。另一个后果是,对国际关系学中体系思想的复杂性理解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为了避免这两个后果的出现,为了建构一种有效而全面的对国际体系的理解,巴里·布赞摒弃了国际关系学界大部分思想家们(如辛格、沃尔茨等)在理论和方法论上的一元论,而从理论多元论的方法论假定出发来建构国际体系理论。“而且,只有采用理论上和方法论的多元论视角,我们才能希望吸纳一些世界史学家发展起来的观念。”

巴里·布赞在区分了科学的世界历史与哲学的世界历史的差别后,考察了在国际关系学、历史社会学、地缘政治学、主流世界历史以及经济史等领域里关于

世界历史的各种观点。当求助于像麦金德这样的地缘政治学家、像霍奇森和麦克尼尔这样的文明史学家以及像琼斯和戴蒙德这样的比较主义学者的作品的时候,作者发现了他们完全迥异于国际关系学中所发现的那些框架:即这些框架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并包括世界历史上的诸文明,甚至包括将这些文明分割开来的不断迁移的游牧民族。巴里·布赞认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概念,是不能与这类框架竞争的。

那么,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将上述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呢?巴里·布赞利用分析层次(levels of analysis)、分析部门(sectors of analysis)与解释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这些工具概念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连接在一起,并据此开辟一条对国际体系进行全方位叙述或描述的道路。同时,巴里·布赞也确立了国际体系的标准问题。首先考察了定义国际体系必要的基本问题:互动(interaction)程度如何?有什么样的互动类型(type)?互动的规模(scale)怎样?互动模式(pattern)有哪些?其次,探讨了下列问题:国际体系由什么单位构成?国际体系是一种机械的还是一种社会性建构现象(phenomena)?体系的单位和结构之间如何联系?出于简练和连贯的目的,作者按照依据工作库思想而构建的年代顺序来阐释世界史中的前国际关系体系、古代和古典时代多重国际体系的兴起与联系以及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建立和演变,这些内容大多数都围绕着四个标题(单位、互动能力、过程、结构)来组织,并把四个标题下的讨论分成四个部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

最后,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还对其理论进行了推测、评估和反思。他们对后现代国际体系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展望,这种展望表现出他们的国际体系思想对国际现象突出的解释能力。他们还提出了国际关系学界和世界历史学界尚需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综观全书我们会发现,布赞和利特尔围绕“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搭建起一个精深的理论框架,这个框架对历史、现实和未来都有非常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我们把他们称为“国际体系学派”,我们会发现他们与“世界体系学派”有非常相近的一面:两者都是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不仅构建起一种新的宏大历史叙事,而且还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元理论”思考,提供了诸多引人注目的“论域”。但“世界体系学派”对军事—政治领域的忽视则为“国际体系”的崛起创造了时机。布赞对“国际体系”历史演变的纵向延伸瓦解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前提,同时也把世界历史研究逼到了一个不进则退的境地。

布赞和利特尔的挑战与贡献

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中所阐释的思

想,对国际关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构成了多重挑战,但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科学发展前景的深深思考。

第一,布赞教授对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提出了根本的挑战。尽管在国际关系学科内部也有范式之争,也形成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和一系列比较成型的观点,但它们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国际关系学者(包括中国学者)看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浓缩了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合作愈益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导方式,冲突特别是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减少),随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上的增多和功能上的增强,基于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解读已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21世纪初,我们用来认识未来世界政治的范式(理论分析框架)正在转变。范式转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范式为理论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①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基本上还是没有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束缚。因此,布赞的框架对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挑战具有根本性质。从这个角度看,布赞的观点不太容易被国际关系理论界所接受。但是,如果不作出相应的修正,布赞所揭示的问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缺陷就会永远在那里摆着,明示着它们的“虚幻”。

第二,布赞教授的研究框架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成熟和成型具有重大意义。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西方国际关系学产生于20世纪一战结束之后的英国和美国,成型于二战后的美国,同时也在其他国家逐步发展起来。但是,这一学科的身份一直没有明确起来。在许多大学里,它一直被视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一些著名的百科全书也把它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来解释。但它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政治学的范围。政治学很早就采用了体系方法,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斯顿承认政治体系是社会体系的一部分。按照布赞和利特尔的观点,一国的社会体系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一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是能够对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过程产生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关系研究的是全人类的问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学范畴所能包含。同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成型的时间晚,交叉的学科多,而且还具有明显的美国化的特点。这或许是国际关系学身份一直未能明确下来的原因之一。

第三,布赞和利特尔在治学态度和风格上也为学术界树立了风范,提出了挑战。布赞和利特尔虽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提出了挑战,但他们的挑战

^① [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年·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并不是一种割断,而是在充分吸收了这一成长中的新兴学科优秀成分基础上的创新;他们承认自己也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学学统的一部分,但通过这部作品,他们把自己从这一学科的威斯特伐利亚束缚中解脱出来了;他们的探索没有囿于一个专业、学科,而是把触觉深深地探入人类学、社会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框架。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学术观点,但他们的学术探索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却不谋而合。沃勒斯坦所指出的“仍然盘踞在许多学者意识深处”的围绕着社会科学分类的两个矛盾,即存在于过去与现在之间和存在于注重研究个别性的学科与探寻普遍规律的学科之间的矛盾,^①在布赞和利特尔的作品中已经不复存在了。布赞和利特尔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但他们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和把握却不逊于西方学术界的一流历史学家。特别是他们通过世界历史考察对国际体系概念的重构,不仅为国际关系学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束缚开辟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同时也为世界历史学科填充了一条主线,给予了启迪。

布赞教授在挑战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基础的同时,也向正在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中国学者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第一,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与我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虽然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但大家公认迄今基本上依然处在介绍和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水平上,距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还有相当的差距。冷战终结的方式及其所促动的西方学术界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为我们缩小与西方学术界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差距创造了一个机会,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更严重的挑战。因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反思与批判已经超越了冷战结束初期的水平,正在表现出把这一学科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趋向。如果说温特的社会建构主义已经与沃尔茨的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的新自由主义呈鼎足之势^②,那么布赞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是对一代学术大师沃尔茨的成功超越。如何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而不是片面模仿和局部引进,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二,同西方国家一样,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同样也处于身份不明的地位。它既没有被设定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却又超过了一个一般分支学科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并且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而正在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研究和教学队伍。但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条块分割、学科壁垒和专业排斥的现象远远超过西

^① [美]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中译本,第104页。

^② 参见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者序,[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还是政治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的领地,还没有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连接起来。如果这种局面在短时间内得不到改善,我们在新的国际关系学的建构中依然要落在西方学术界的后面。

第三,同其他学科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本身本质上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布赞教授在写给笔者的信中承认“我们自己当然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传统范围内,我们又是迄今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美国传统的组成部分”,并希望《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将刺激和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发展自己理论化国际关系的方式,并将其置于全球辩论的平台之上”。“随着权力愈加广泛地分布于世界,随着文化多元主义重申自己的权威,国际关系研究需要代表非西方经历的声音和视角。”问题是,如果西方学者被“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束缚住了,还情有可原;但如果西方学者已经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而我们这些非西方人还在这种束缚中自得其乐,那不是很可悲吗?

最后,我们似乎应该对布赞的“学派”属性给出一个交代。因为这是一个困扰人们许多年,同时也是许多年来人们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许多人都把他视为英国学派新的领军人物,但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笔者虽曾有幸求学于布赞教授,但对他的学派属性也难下定义。为了给关心他的中国读者有个交代,笔者在本书的翻译即将完成之际,专门求教布赞本人。他的回答是:“关于学派,我认为我难以被塞进任何一个学派。我深受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并依然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但并不是一个停下来的好地方。一般地说,我喜欢结构方法,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社会的,但这是一种个人的偏好,而不是思想上的信奉。从这一点上说,我一生是一个理论上的多元论者,乐于思考任何一种能对眼前的问题提供深入探察的方法。我不认为理论流派之间有不可通约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派对我富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我采用多种学派的方法(新现实主义、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但难以肯定我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希望这些对你有所帮助。也许只是令人费解。”

布赞的治学方法似乎也向中国学者提出了挑战和借鉴。

刘德斌

2003年12月28日

中文版序言

本书试图探讨国际关系学理论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旨在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们写作本书的动机是考察什么样的世界历史可以用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工具库来进行阐释,同时也考察一个更长的历史跨度和一个更宽的地理范围,将对国际关系学理论形成什么样的挑战。我们觉察到这样一个事实: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情形产生了一种深受限制的观点,所以我们认为它发挥着一种“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作用。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常被用于标示欧洲国家体系的开始。这种视角的支配地位产生了几个后果:它意味着一种无政府结构和均势行为的假设被植入国际体系的正常条件,并衍生出历史的其余部分;它意味着部落、帝国、城邦国家和其他政治形式被边缘化了,而国家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定义性实体;它意味着作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学不仅通过一个高度扭曲的透镜(在某种程度上它干扰了对历史的整体考察)来考察1500年以前的世界,而且它还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超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国际关系形式的前瞻能力;它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我们发现,国际关系学主流方法论最为窘迫的是,多数理论家竟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披上了这件束身衣。

我们自己当然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此传统范围内,我们又是迄今为止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英国—美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我们努力以一种尽可能不偏不倚的方式来建构对国际关系学的世界史阐释,但我们仍然意识到我们尚未从作为我们自己文化创造物的处境中完全摆脱出来,而且我们所采用的分析工具本身就携带着文化的包袱。因此我们知道,“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的说法将在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家那里产生反响,但我们不能确信这种反响能否延伸得更远。我们猜想我们使用的语言或许会给我们的译者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然而我们希望我们已经表明,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基本工具是如何既可以用来呈现,又可以用来强调一个比主导多数当代国际关系撰述更为宽阔的历史框架的重要意义。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更加意识到了绝大多数国际关系思考在文化上的狭隘性。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和美洲土著的经历很少被写进国际关系学,人们也

许并不感到惊讶。撒哈拉以南非洲,还有澳大利亚,没有充分发展起任何一种大陆政治体系,而美洲某些主要帝国的政治体系却发展起来。在它们遭遇欧洲时,这些政治体系很快就被彻底清除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表明,有关这些体系的知识,对于理解定义国际关系的实践是如何演化的富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更为令人困惑的是国际关系学中东亚、南亚和西亚诸种伟大文明内容的缺失。在这里,历史悠久的帝国传统所定义的国际关系的方式及实践与后来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关系的方式及实践截然不同。这些体系以及它们的实践延续了几千年,并且在许多方面都对多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和预言嗤之以鼻。不理解它们,我们就既不知道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它走向何处。令人惊讶不已的是,这些历史经历很少被那些文化用来形成它们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在这种意义上,通过西方历史的特殊视角解读世界历史,国际关系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表现出来的是成功的西方帝国计划意外的负面效果。考虑到过去三个世纪以来西方实力的支配地位,这个效果并不完全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是,即使在恢复了亚洲各民族政治独立的非殖民化半个世纪之后,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在国际关系的思考中居于不变地位。

触发我们不满的缘由之一是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非历史特征,倾向于把作为一个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幽闭在它自己制造的牢笼之中。历史是社会科学的共同基础,没有对历史的系统参照,国际关系学就难以形成它需要具备的对其他社会科学宏观方面的影响。本书因而代表着迈向“宏大理论”的一种尝试,整合众多相对狭窄的学科分支,表明它们如何可以共同发展,以向着一个更为整体的理解推进。特别是,我们发现自己更接近英国学派,它的基本参考框架看起来非常适合我们希望建构的更为宽阔、更具历史根基的国际关系学研究方法。英国学派理论的重大价值在于它容许人们同时思考国际体系的标准和材料结构,不是把它们当成一种机械的互动模式,而是当成有意识地建构和维持的国家社会。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两个在英国工作的学者表示他们被英国学派所吸引看起来可能令人困惑,甚至有为自已谋利的明显色彩。所以让我们在这里说清楚,英国人至于英国学派并没有独特之处。英国学派只是一个相当不适宜的标识,一个恰巧坚持采用历史的、社会的和理论的多元方法理解国际体系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标识。

如果说本书有什么重大启示的话,它们可能被概括如下:

- 离开经济和社会维度,就难以理解国际体系的军事—政治维度。
- 经济体系具有一种强烈倾向,它不仅在范围上比军事—政治体系更广,而且当国际体系达到地理意义上的闭合时,经济体系也比政治—经济体系更强。
- 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观对流行的多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许多质疑。

II